

A Crisis
or
a Rebirth

危机或重生?

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命运

郑永年 著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只有通过继续改革，中国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
国家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了。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A Crisis
or
a Rebirth
危机或重生?

● **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命运**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郑永年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 / 郑永年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213-05240-8

I. ①危… II. ①郑… III. ①金融危机-中国-文集IV. ①F83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254 号

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

作 者：郑永年 著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王利波 张炳剑

责任校对：张志疆

电脑制版：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1.6 万

插 页：2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5240-8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前 言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对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产物。也很清楚，世界经济的失衡是各国经济体内部失衡的结果。一旦我们深入到各国经济体内部，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内容。不难发现，各国经济失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失衡表象反映出来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间的政治几乎是围绕着如何应对危机而展开的。各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不断升级，但对危机的反思仍然肤浅。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策层面，作者觉得对危机的反思和分析，都可以获得知识上的巨大收益。收集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九篇文章（大多是会议和论坛的演讲稿），就是最近这几年作者反思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物。

经济全球化已经造就了这样一种全球关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

经济或者金融危机面前置身事外。在全球化面前，大家不得不面临一些共同的选择，或者让危机恶化，或者获得重生。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如此。本集子所选择的文章尽管也涉及世界经济，但都是以中国为主。世界经济给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外在的压力不断演变成内部的压力，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社会层面，中国社会正面临各种严峻的内外压力，整个中国都在求变。而变革也促使着重生。“重生”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概念“危机”的本来含义。

这个集子的出版还得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王利波女士。没有她的努力，集子很难在这个时候就和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2年7月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 001

1 当前世界经济危局和中国应有的理性思考

世界经济怎么了? / 001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 / 004

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 008

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吗? / 015

中国怎么办? / 022

2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全球化与中国 / 033

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 037

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 040

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 / 046

全球化与弱政府 / 049

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 055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 061

中国模式的未来 / 067

3 民生还是民主？中国改革下一步

奇迹的背面 / 093

重新确立改革方向 / 097

民主和民生谁先谁后 / 101

重在培育中产阶级 / 109

4 拯救改革：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南巡”的历史意义 / 119

中国目前的改革状况 / 123

下一阶段的主体性改革 / 130

呼唤科学的顶层设计 / 132

5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和政策选择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 139

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起源 / 141

收入差距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 144

已经付出的分配调整努力 / 146

收入分配调整的远景 / 148

6 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 150

对中国腐败的几种认识 / 153

经济改革 / 159

社会改革 / 166

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 169

7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地方？

地方和中国的改革进程 / 174

为什么地方创新是可能的 / 177

目前的困局 / 182

未来怎么做 / 185

简短的结论 / 188

8 市场经济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 189

市场经济改革 / 195

社会改革 / 209

行政改革 / 216

简短的结语 / 222

9 当代中国外交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挑战

文化地缘的转移 / 225

地缘政治的转移 / 231

中国外交国内环境的变迁 / 237

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 / 243

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 249



当前世界经济危局和中国应有的理性思考

世界经济怎么了？

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似乎山穷水尽，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危机的举措，很多政策表现得越来越自私，即只考虑本国的并且是眼前的利益，结果导致更大的危机。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国际经济正处于危局之中。大家都知道危机会随时发生，所不能确定的是危机到底会在什么时候爆发。这种危机感对于社会的各个群体来说都是真实的。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穷人来说，随着物价的不断变动，生活越来越拮据。中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很大挤压，有再平民化甚至贫穷化的趋势。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似乎山穷水尽，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危机的举措，很多政策表现得越

来越自私，即只考虑本国的并且是眼前的利益，结果导致更大的危机。即使是在危机中正在大发横财的金融阶层，也感觉到了危机的真实性。这个群体属于少数，他们是危机的真正受惠者——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危机，动用纳税人的钱给金融行业注入了大量的支持，使得“危机”变成了“机会”——但是，即使是他们，也知道经济的这种运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只不过这个群体难以在任何意义上超越自私，为他们自己长远的利益着想，相反，他们正在变本加厉，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大捞一把。

各个阶层的人们坐等着的危机，既是 2008 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延续或者恶化，也是各国政府自 2008 年以来无能拯救危机或者拯救危机无效的结果。危机发生了，大家自然希望有拯救者。那么，谁是拯救者？市场还是政府？西方还是非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还是中国？

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对所有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没有答案自然就没有信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忙于拯救经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没有深刻的认识，因此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出现了新的病症。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各国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推出所谓的“救市”方案，把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市场，金融业开始复苏。但不久，很多信奉市场的观察家开始盲目乐观起来，叫嚷着要赶紧“退市”，即政府从市场退出。因此，人们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如何“退市”。但没有想到，退市政策还没有执行，新一波的经济危局又来临了。

很显然，2008 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局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的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很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高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这是社会主义过度的产物，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而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就成为必然。美国的社会主



因公共领域债务和赤字引起的欧债危机令西方各国焦头烂额。(图 /CFP)

义成分不像欧洲那么高，但 2008 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意在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规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联。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自从危机发生以来，不能说西方各国政府不努力，实际上，各国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应对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作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对危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危机呢？这就需要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而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不难看到，西方现在正面临着两大

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产生。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

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第一大矛盾是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与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与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尽管金融资本也有“投机”性，但这种“投机”性的交易还是和实体经济相关的。但对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而言，“投机”或美其名曰“金融工程”本身就变成了主体。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这一套利过程，又是通过无数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的，而衍生产品的本质，就是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设计并通过各种市场变化来获利的“风险规避工具”，抑或数学化的赌具。因此，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勤劳工作、创造发明而致富，现在这些品德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因素，如勤俭、节约、勤奋努力等美德，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抛弃。而与产业资本关系密切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荡然无存。如今的很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代表作。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大陆发轫和发展的根源，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的人。从前有个“美国梦”，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这个梦现在不再现实。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而后者不必依赖前者。昔日，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这是金融资本本来的意义；但今天，金融资本控制大量的资本或者货币，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量的资本或者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货币资本主义。由于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金融资本，今天很多制造业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控制。金融资本也已经不是为了实体经济的创新，而是在扼杀着大量的技术创新。一旦金融资本感觉到一种新的技术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冲击，拥有庞大资本的金融业就会买断技术发明。从前，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大鱼吃小鱼”，这里，至少大鱼把小鱼吃到了肚子里，养大了自己；但现在不一样，金融资本只是把“小鱼”杀死，弃之于垃圾，免得“小鱼”日后长大威胁到自己。（由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巨大的变化，原来经

济学的货币和实体两分的概念不存在了。金融资本既控制货币发行，也成了最大的“实体”，居于当今经济体系的核心。)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呈现出三大趋势。

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如华尔街）往往是“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其逻辑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因此，你如果还想活下去，首先必须把我救活”。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来拯救美国的金融业。但是，荒唐的是，金融业的复苏并不表明实体经济的复苏。由于上面提到的单向面的依赖缘故，一旦金融业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当然，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那么多年了，这个思想还只停留在思想层面，要转化成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金融业凭其巨大的财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像 2008 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促成美国政府推动这项立法进程。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不产生就业是当代金融业的性质决定的。首先是全球化。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并无意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回报。其次是当代金融业的技术性质。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计算机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构来看，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那些毕业于著名大学的优秀分子，也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需要的大量雇员。

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克南最近抱怨说，失业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这两个特点，加上上面所说的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扼杀，表明如果金融资本主义照此发展下去，其越发达，就业情况就会越糟糕。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的话），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只有当一切货币化了的时候，它们才可能成为“流动性”的一部分，才可以进入金融交易的过程。金融资本要求各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要求开放资本账户，要求用货币来量化财产的价值，等等，这一切都不难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金融业也不需要传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权力的干预。相反，在很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需要政治权力来帮助推进事物的“货币化”进程。这典型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和专制政权之间的精诚合作上。在一些专制国家，私有化运动远较民主化国家来得有效和彻底。在那些地方，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推动了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又推动着“货币化”，最终又服务于资本与权力。

诚然，并不是说没有政府认识到货币化的弊端和恶果，但几乎没有政府能够拒绝金融投机为其所带来的“快钱”（短期内的经济景气），还美其名曰“生产效率”。这方面，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政府需要大量的钱，就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让金融投机大行其道，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兴风作浪。对美国来说，由于其金融系统控制了整个世界，它通过金融业的投机，就能把其他国家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上来。有这么大的好处，美国政府是不会对金融业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管的，尽管金融业这样做也在其国内制造了很多问题。

有人指出，如果当时奥巴马政府不雇用金融業者，而是雇用来自实体经济部门的人来做政府的经济顾问，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这话并非没有一点道理，雇用金融资本者做顾问或许能够看到金融资本是如何操

作的，但是政府很难对金融业出台真正有效的管治和规制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当今的其他政府，都是 GDP 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作怪。金融业是来钱最快的行业，有哪个政府真正想限制其发展呢？很多国家的政府宁可等待着未来更大的危机，也不愿或者没有实际能力来促成金融资本的转型。

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得不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的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与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从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由资产者所建立、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的。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

法团主义 (corporatism)

也被译为“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以及“阶级合作主义”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它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其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

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伴随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由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是这样。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